

# 乾隆朝大小金川战争问题研究述评

王惠敏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思政教研部, 浙江 绍兴 312000)

**摘要:**乾隆朝两次金川战争对清代乃至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自清代迄今,不少学者对金川战争问题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或以清朝的立场来探讨战争的影响、得失及善后问题,或对战役起因、经过和结果展开描述,或从边疆史、民族学的角度探讨战争问题。由于受档案资料开放和限制,对金川战争相关问题的探讨缺乏应有的深度和广度。

**关键词:**乾隆朝;大小金川战争;研究述评

**中图分类号:**K24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639(2014)05-0066-06

## Review of Studies of Jinchuan Wars in Qianlong Dynasty

WANG Hui-m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Department, Zhejiang Yuexiu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Zhejiang Shaoxing 312000, China)

**Abstract:** Two Jinchuan wars in Qianlong period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Qing dynasty and future generations. Therefore, far from the Qing dynasty, many scholars conduct researches on Jinchuan wars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such as the influence, the gain and loss, and the remedial measures, or the description of the process, or the discussion about the borderland history and ethnology. Due to the limited materials, the in-depth research is still needed.

**Key words:** Qianlong period of Qing dynasty; Jinchuan Wars; literature review

大小金川僻处川西一隅,因乾隆朝两次大规模的征讨著称于世,亦因此,自清代以来就有不少人对大小金川战争问题进行研究。通过爬梳相关研究成果,我们发现这样两个问题:其一,长期以来,人们主要着眼于描绘两次金川战役的过程和结果,以及从清廷的立场出发讨论大小金川战争的性质、影响等问题,而许多颇为值得探讨的问题却几乎没有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其二,因受史料开发和利用的限制,绝大多数相关研究成果仅以《清高宗实录》《平定金川方略》《平定两金川方略》等官书为依托,没能利用大量相关档案史料;其三,研究者先入为主地将金川战役问题归入民族史、边疆史、地方史或战争史思考模式,以致对该问题的研究显得颇为杂乱、割裂,缺乏整体史研究眼光。

### 一、清代相关论著

除清廷将两次金川战役的过程和结果写进实录、编纂入方略以便永垂后世外,清代学者亦对大小金川战争问题进行或详或略的论述,凸显了他们对乾隆朝两次金川战争的不同认识。这些论著不仅为我们研究大小金川战争问题奠定了学术基础,还为我们进一步研究相关问题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乾隆朝进士程穆衡著《金川纪略》<sup>①</sup>详细论述了清朝初年用兵瞻对时首次征讨金川的历史背景和过程,正文记事起自乾隆八年(1743年)十二月,止于乾隆十四年(1749年)二月,注文语涉乾隆二十一年(1755年),凡五万余言。有清一代,有关乾隆朝首征金川的档案和著述都不多,而《金川纪略》所据多系奏章上谕,并结合亲身见闻,因此颇具史料价值。在该书中,程氏指出乾隆皇帝之欲用兵金川,最直接的原因是此前用兵瞻对劳师糜饷却草草收场,有损国威,乾隆皇帝对此始终耿耿于怀,获知莎罗奔侵扰邻封,便欲通过用兵金川以雪前恨,并借机加强清政府在该地区的统治。据此,可以为我们解释为何一向不主张暴力介入川西土司内讪的乾隆皇帝,陡然下令坚决出兵金川。程氏还指出清廷贸然决定出兵金川还与当时任川陕总督的庆复、四川巡抚的纪山“羨彼滇、黔二人所为,争以开夺番地、掠其畜聚为事,惟欲寻衅为兵端”<sup>[1]191</sup>有关。更难得的是,与《平定金川方略》等官书极力为清廷遮丑相反,程穆衡则通过对第一次金川战争的翔实记述,充分暴露了清政府在这场战争中劳师糜饷、损兵折将,最后仍不得不草草收场的窘局,并大胆指出:“自瞻对、大金川用兵以来,川省糜食腾贵,公私糜弊,西南为之重困。”<sup>[1]196</sup>

收稿日期:2014-06-03

作者简介:王惠敏(1981—),女,湖北罗田人,讲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明清社会文化史研究。

①有清抄本藏于四川大学图书馆。

王昶《蜀微纪闻》<sup>[2]</sup>是根据其亲身经历写成的一部关于第二次金川战争的行军、作战日记,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王昶在紧张的战斗间隙,详细记录了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九月至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三月间的军中战情,恰好可补现存《金川档》之缺。

乾隆末年,赵翼著《皇朝武功纪盛》,凡四卷,三万言,涉及平定三藩、对准噶尔部战争、对缅甸战争、大小金川之役、镇压林爽文、庄大田起义、远征廓尔喀等边疆重大事件,目的是“铺张鸿庥,扬厉伟绩”<sup>[3]</sup>,即宣扬清朝统治者的煊赫武功。其中,《平定两金川述略》一文叙述了战争始末,并将第一次金川战争全归咎于当时的四川巡抚纪山轻启战端,后人亦多袭此说,但因所记多依据传闻,史料价值有限。

道光年间,魏源著《圣武记》,欲通过研究清朝开国以来的武功盛事,总结出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再针对当朝国家形势提出切实可行的主张。其中,《乾隆初定金川土司记》一文着重叙述金川地险碉坚、番人齐心抗战使得清军陷入劳师糜饷、损兵折将的泥潭不能自拔的窘困局面,而乾隆皇帝对金川之役“劳师两载,诛两大臣,又失任举良将”<sup>[4]301</sup>难以释怀,深恨讷亲、张广泗不早实奏“(金川)其地险力艰不足殫师旅”<sup>[4]301</sup>,最后却不得不趁金川乞降之际急命撤出大军。对此,魏源借傅恒奏言总结道:“(金川一役)较唐人之攻石峰堡,尤为得不偿失”,“金川军事,误于初起之时,蛮酋本在化外,止可略惕以威,不必深入其阻,一误再误,以汙于今。”<sup>[4]300-301</sup>然而,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小金川土司再起衅端时,乾隆皇帝以为此乃前次宽大受降所致,深悔姑息,决心对其大加惩戒。而《圣武记》中的《乾隆朝再定金川土司记》一文则不仅清晰地叙述了清军再征金川之前的形势、进剿大小金川的曲折过程,还指出了造成此战极其艰难的主客观原因。

此外,昭槁《嘯亭杂录》中的一则笔记《金川之战》简要介绍了金川历史沿革、交通、气候、物产、居屋等情况,描述了战争的过程和结果,还特别指出因大金川进攻革布什咱和明正时,正值庆复用兵瞻对草率完局,令乾隆帝很不满意,而川省巡抚纪山因觊觎庆复之官位而力主用兵进剿,遂启战端。该书另一则笔记《木果木之败》以将军明亮同他的谈话内容为据,生动再现了第二次金川战争中木果木大败惨状,认为主将温福未能乘锐直进,坐失良机,使兵心溃散,以致番人急攻营寨时数万清军不战自溃。这些史料亦可补官书、档案之不足,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 二、国内外研究述评

尽管清人已在相关著述中对大小金川问题加以叙述,但该问题很晚才进入今人的研究视野。据笔者所知,除马长寿先生于1944年10月在《民族学研

究集刊》上发表《嘉戎民族社会史》一文,论及大小金川的地理位置、气候、土司世系,以及两次金川战争的过程和结果外,直至20世纪80年代初,国内外学者才开始关注大小金川问题,并在最近三十年间,先后有数十篇学术论文、一部专著、一篇博士论文问世。其中,大多数研究成果主要着眼于描述两次战争的过程和结果,并站在清廷的立场上探讨战争的得失、影响及善后等问题,并因受到档案资料开放和限制,使得相关问题的探讨缺乏应有的深度和广度。此外,还有一些选题较为新颖的与大小金川问题相关的补充研究。

### (一) 大小金川战争的评价

最早对乾隆朝两次金川战争的经过以及善后措施进行了较为全面论述的是台湾庄吉发先生。他在《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sup>[5]</sup>一书第四章“治番政策的改变与大小金川之役”,充分利用中国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藏《金川档》《军机处月折包》等档案,并结合《清高宗实录》《平定金川方略》《平定两金川方略》《清史稿》等官书,主要对两次战役起因、经过和结果展开描述,并从清廷的立场出发,认为:乾隆皇帝为消弭边患,不得已而用兵金川,其成就并不限于军事上使大小金川及其周边各土司皆隶版宇,战后通过安营设镇、改土为屯、雍发易俗、改奉黄教等措施,加强了国家对该地区的治理,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并促使当地番民逐渐内地化。须指出,该文只是作者“乾隆朝十全武功”研究的组成部分,而非对大小金川问题的专题研究,因此很多相关问题仍有待研究。

曾唯一《乾隆平定金川后的善后事宜》<sup>[6]</sup>一文以《清高宗实录》、有关志书及《金川案》为据,认为:清廷处置金川善后事宜的积极后果是主要的,因而评议金川战役不能仅以战争过程中的得失为依据,而应该联系善后事宜及其效果加以考察,金川战役有得有失,绝非徒劳无功,应该说它的积极后果和影响还是主要的。李涛亦在《试析大、小金川之役及其对嘉绒地区的影响》<sup>[7]</sup>一文中认为,大、小金川战争给金川地区带来的巨大灾难,然而对全国的统一、嘉绒地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而积极的影响。

雀丹《评乾隆两度平定金川的实质》<sup>[8]</sup>一文,则对自清迄今人们多将此战定性为“土司叛乱”、清政府对金川进行的一场“平叛”战役,以及此战为国家统一奠定了基础等论调不满,认为单就两次金川之役所带来的民族灾难,乃至后来的民族矛盾都是极严重的,对国家、对民族并无丝毫益处,只是对清王朝震慑土司起了杀一儆百的作用,是乾隆皇帝承传所谓的“以番治番”策略失效后,采取武力暴政制造的一起大冤案。就目前所见,该文是仅有的、完全站在大小金川的立场,对两次金川战争大加挞伐的“檄文”。全文笼罩着强烈的民族愤恨之情,这大概与作者系藏族人,并长期在阿坝州任职不无关系。

戴逸、华立《一场得不偿失的战争》<sup>[9]</sup>一文,秉承魏源《圣武记》之《乾隆初定金川土司记》和《乾隆再定土司记》之说,以《清高宗实录》为据,首先,从天时、地势和人心趋向三方面分析清王朝在大小金川战争中劳师糜饷、事倍功半的原因;其次,从大小金川的地理位置及乾隆皇帝好大喜功、穷兵黩武的倾向来分析清朝用兵大、小金川的原因;最后指出乾隆皇帝发动的大小金川战争是一场错误的、得不偿失的战争。曹启富《略论乾隆年间大小金川之役》<sup>[10]</sup>一文亦认为金川之役局部所得不能弥补全局所失。

李鸿彬、白杰《评乾隆朝金川之役》<sup>[11]</sup>则称:既不同于民族压迫和歧视激起的少数民族起义,亦不同于阶级压迫、官逼民反而掀起的农民战争,金川之役和平准、平回的性质相同,即反清的地方叛乱,从国家战略大局出发,清廷必然要发动对金川的战争。张婷《试析第一次金川战争爆发的直接原因》<sup>[12]</sup>一文指出:“阿扣事件”、边吏喜兵事厚利而极欲开启战端、瞻对之役的后患,以及清廷不习番情等因素错综交织,最终引发了一场虚掷巨大人力、物力的战争。彭陟焱先在《乾隆初定金川战争钩沉》<sup>[13]</sup>《试论乾隆平定金川之影响》<sup>[14]</sup>二文中指出:大小金川之役对清政府的经济、政治和民族关系的发展都产生了负面影响,在客观上对嘉绒藏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后又在其博士论文《乾隆朝大小金川之役研究》<sup>[15]</sup>中强调:清军两征金川,是清王朝对聚居于川西北藏族土司上层发动的地方叛乱而进行的征讨。

齐德舜的硕士论文《清乾隆年间攻打川西北大小金川战役研究》<sup>[16]</sup>,则试图对大小金川战争问题进行新的定位:大小金川战役暴露了清王朝的众多弊端,从中可以看出清朝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但这两次战争也有它的历史功绩,即清政府通过战争的方式,维护了自己对川西土司之间的统治,确保了自己的权威,只是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

王戎笙主编《清代全史》第四卷之《平定大小金川》<sup>[17]</sup>指出,乾隆朝第一次征大金川是一项轻率的决策,最终使清廷陷入一场无谓的战争,难以自拔,此后清廷不顾第一次金川战争的教训,再次出兵大小金川,历时五年,劳民伤财,但从历时的长远发展角度来看,平定两金川也不是绝对没有意义,毕竟消除了以往土司间的攻杀掳掠,而且为促进与内地的文化交流创造了条件,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和社会进步。

## (二) 大小金川善后措施及影响

清廷彻底平定大小金川后,采取设立成都将军、安营设汛、去土为屯等善后措施,从军事、政治、经济、宗教等方面对其加强控制,从而在两金川及其周边土司地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此,以改土归屯为中心的两金川善后问题成为学者研究的焦点之一。

李家瑞《川西北嘉绒藏族的土屯制度》<sup>[18]</sup>一文

最早关注两金川的屯土制度问题,认为清王朝在大小金川平定后实施的改土为屯制度的实质是一种特殊的土司制度,也就是说改土为屯没有改变当地土司割据的性质。这一论断值得商榷。很显然,我们不能因为清廷在实施改土为屯措施时,对少数嘉绒藏人论功行赏,划拨少量土地和土民,委任以土守备等土职,便认为改土为屯的实质仍是一种特殊的土司制度,毕竟军屯和民屯占绝对优势,而且清廷对屯地土官和土民的控制亦非常严密。

曾唯一《乾隆平定金川后的善后事宜》<sup>[19]</sup>一文先分述金川善后各项措施,进而总结出以改土归屯为中心的各项善后政策,在许多方面均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 在军事上,它结束了近三十年之久的混乱局面,使大小金川以至整个四川地区从此得到了相对的稳定和安宁,也使影响全国不少地区的金川事件得到妥善解决;2. 在政治上,清廷对金川实行改土归流、改土为屯,采用各种与内地一致的政治划一政策,从此大小金川牢固地归属于中央政府统属之下,使该地区加强了与中央及内地的联系和交往,这有利于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有利于金川地区的开发;3. 经济上,广兴屯田,大办屯务,使金川地区得到进一步开发,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4. 在民族关系的处理上,就乾隆帝处置善后事宜的政策、措施本身而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总的说来也是比较得当的;5. 因此,从局部与全局、暂时与久远的角度来研究,金川事件绝非徒劳无功,应该说它的积极后果和影响还是主要的。

潘洪钢撰《乾隆朝两金川改土归屯之兴起》<sup>[20]</sup>一文厘清金川改土归屯政策兴起至最终定制的过程,认为两金川改土归流起于乾隆初年的第一次金川战争,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才议定在小金川安屯,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初议定在大金川设屯之事,及至四十一年(1776年)两金川平定,设屯事宜方成定制。另外,潘洪钢在《清代乾隆朝两金川改土归屯考》<sup>[21]</sup>一文中专门对改土为屯的原因和改屯后的屯政进行分析,认为乾隆朝改土为屯是清代对南方民族治理的一次重大修正。作者通过比较研究发现:金川屯制虽与贵州苗区稍异,但其设屯宗旨如出一辙,均以安定地方、遏制土司叛乱及各族人民反抗为目的;金川屯田来源与后来湘西苗区屯田来源相比较为单一,然与黔东南屯田略同;与改土归屯诸地相比,金川设屯种类最多,并通过对屯户和屯政的管理逐渐形成了一套较完整的屯土体制,对当地历史发展和整个清朝南方民族治理政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徐怀宝《清代金川改土为屯》<sup>[22]</sup>一文主要对大小金川改土为屯的背景、内容和主要特点进行总结,并分析了改土为屯的历史作用和重要意义,认为改土为屯具有屯田和改土归流相结合、兵番民错处、经营耕种既自主又分散等特点,在中央加强对两金川地区的统治、解放当地生产力、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及

藏汉民族融合交流等方面都具有积极意义。

蔡仁政《金川嘉绒藏族的土屯制》<sup>[23]</sup>一文则对屯官的封赏和承袭、土屯的土地制度、土屯制度的本质等问题分别加以论述,认为清廷在大小金川实行的土屯制,是清王朝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参考中国历史上的屯田制,仿效绿营兵制的办法而创建的统治边疆的一种制度,并认为准军事组织是土屯制度的本质。

石硕的硕士论文《试论清代乾隆年间绒藏地区改土为屯政策》<sup>[24]</sup>,在充分吸收已有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有关官书和地方志史料对乾隆年间在川西杂谷和大小金川地区改土归屯政策的出台背景、目的,以及屯制、屯政分别加以论述,认为该政策是对原来土司政治的一种改革,即以新的屯垦制度取代了原有的土司政治,新的屯政中对原土司制度的改革集中体现在“汉土共治”的职官体系以及“兵屯一体”的屯垦体系上,而且改土为屯政策的实施不仅有效地免除了土司对百姓的掠夺和土司间内讧,还加强了中央政府对嘉绒藏族地区的有效统治。该文还结合个案对屯政、屯制进行具体分析,使我们对该政策的了解不再停留在政策条款层面。

### (三) 大小金川难以攻克的原因

王惠敏的博士论文《清军难以攻克大小金川之原因探析》<sup>[25]</sup>,尝试运用文献与田野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清军难以攻克大小金川的主客观原因进行深入的探析,即以有关官书为向导,以《金川档》《军机处录副奏折》《宫中档朱批奏折》《宫中档乾隆朝奏折》《清宫珍藏海兰察满汉文奏折汇编》等相关档案为基础,结合田野调查资料,着力探究清军难以攻克大小金川的多重原因。就客观因素而言,金川地区险恶的地形、坚固的战碉、恶劣的气候、彪悍善战且同心誓死的属众均给清军的军需运输及战事进程带来巨大的阻遏,使得数万乃至近十万官兵长期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就主观因素而论,首先,乾隆皇帝在对大小金川不甚了解的情况下仓促出兵,且每次出兵前均严重低估了作战难度,这不仅给清军的后勤运输造成巨大压力,还直接影响了清军在战争前期的进剿效率;其次,将弁措置不当且相互间失和则直接给清军进剿带来诸多失误,结果既影响士气,又严重阻碍了战争进程;最后,作为清军主力的绿营官兵怯懦畏战,纪律涣散,而作为清军重要补充力量的从征土兵又不足倚恃,这使得大批清军在与强悍善战的大小金川人进行对抗时,屡屡受挫,甚至不战而溃。该篇博士论文不仅加深、丰富了我们对于大小金川战争问题的认识,而且使我们得以借此管窥当时国家机器的运转效率及活力。

### (四) 大规模的社会动员与军需运输

戴映从(音)《金川之役中的清朝政权、商人和役夫》(Dai Yingcong *The Qing State, Merchants, and*

*the Military Labor Force in the JinChuan Campaigns*)<sup>[26]</sup>,这篇发表在美国著名清史研究期刊《帝制晚期中国》第22卷第2期(2001年)的长文,主要探讨清政府如何运用雇佣劳动的新方法,在两次金川战役中如何形成一种征用、组织大规模军事劳动力的特别制度,以及清政府如何努力利用商人来弥补官僚机构在这项工作中的不足。该文作者特别强调:乾隆朝的许多战争都是用大规模的社会动员来支持军事行动,其中两征金川尤为突出,与乾隆朝其他边疆战争相比,两金川战争,特别是第二次金川战争动用的人员比任何一次都要多,且使用更多办法动员各种社会力量,更重要的是,两次金川战役给清朝后来的战争留下管理雇佣军事劳力的丰富经验,因此,在军事史上这两次战争值得特别关注。这篇文章虽与金川战争军需供应问题紧密相关,但着力探讨清廷为解决军需供应问题而如何征用和组织大批劳动力、如何利用商人力量的机制及其意义,角度新颖,论述十分细致绵密。

赖福顺著《乾隆朝重要战争之军需研究》<sup>[27]</sup>一书从相关档案入手,结合其他官书,对两次金川之役的军行事宜、军粮事宜、军器供给、军报传递、军马驮只供给、军饷与赏恤、士民之捐纳与捐输、军需报销与军费统计等问题分别加以论述。截至目前,该书对两金川战役各项军需问题之研究最为系统、扎实。

### (五) 专著

彭陟焱的《乾隆朝大小金川之役研究》<sup>[28]</sup>一书,由其博士论文(中央民族大学,2004年)修订而成,是目前对大小金川战争问题进行研究的唯一一本专著。作者以《清高宗实录》、《平定金川方略》、《平定两金川方略》、清人笔记、地方志,以及已有研究成果为依据,着重叙述两次金川战争的过程、结果,并对金川善后措施及其影响等问题进行论述,以金川战争对清王朝的影响为落脚点,得出这样的结论:乾隆平定大小金川是清朝中期的一次较大规模的战争,它直接反映了清代的民族矛盾和民族政策;两次用兵金川是清王朝对聚居于四川西北部的藏族土司上层发动的地方叛乱而进行的征讨,目的是为了维护各民族的团结,稳定藏族地区的局势,加强对四川西北部嘉绒地区的控制;对于嘉绒地区而言,战争是残酷的,几乎使两金川地区沦为一片废墟,但乾隆皇帝在战后对嘉绒藏区实行的一系列政策,从各方面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和融合,促进了当地生产力水平的发展,加速了嘉绒地区在清朝中央政府直接统治下的封建化进程。作者还特别强调金川战争是为了维护国家统一、保持多民族国家的稳定而采取的一个大胆的举措。

### (六) 其他研究成果

尽管大多数学者主要围绕大小金川战争的过

程、善后及影响等问题进行反复研究,但还有一些其他相关研究成果值得关注,因为,某些研究成果无论在选题方面,还是在论证角度方面均多有创新。

杨嘉铭《四川甘孜阿坝地区的“高碉”文化》<sup>[29]</sup>一文论及“高碉”文化产生的历史原因及其与大小金川战役的关系,指出大小金川战争就是战争双方围绕攻碉、守碉这一核心而展开厮杀,而金川土司正是凭借险要地形和坚碉林立的有利条件不断使清军遭受重创。

陈庆英《北京香山藏族人的传闻及史籍记载》<sup>[30]</sup>一文,对有关传闻和史料进行考察后指出:清朝在两次金川之役的战争中都曾将部分投降的金川藏族迁移到北京,特别是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迁来的人较多,以至清朝专门将他们编为一个佐领,归入内务府正白旗,并指定他们在香山建筑碉楼居住,由健锐营就近约束、管理的这些金川藏族人带来了他们的语言、习俗、歌舞、建筑碉楼的技艺等,具有自己鲜明的文化特点,至今虽然已经过去了二百多年,但香山的藏式碉楼依然有遗存,香山藏族人的后裔中还流传着藏族的歌曲,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民族文化现象。同时,作者还注意到,有的专家仅依据新中国成立初期这些香山藏族人的后裔曾说自己是苗族的后代,而认定这批人是苗族后裔,这个论断值得商榷。

陈力《〈金川纪略〉及其相关问题》<sup>[31]</sup>一文指出,程穆衡著《金川纪略》是一本关于第一次征金川之役的重要史料,与官修史书相比,它对该次战役的起因、经过和结果提出了新的资料、新的见解,并进行了详细的描述。

刘源《从清代档案看清政府对金川土司政策》<sup>[32]</sup>一文,依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有关档案史料,探讨清政府对金川土司所采取的政策及其演变。作者认为清政府在对待金川的问题上,经历了沿袭明代土司制度到“以番攻番”“剿抚并用”,以及最终实行“改土归流”政策,是清中央集权专制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

聂崇正《清平定两金川功臣像钩沉》<sup>[33]</sup>一文,对现藏德国柏林的国立民俗博物馆内七幅平定两金川功臣油画肖像进行简要考辨,并介绍了画像的形制规格和画像上的赞语。我们可以借助存世的番将画像观摩其独特的服饰、容貌,感受其彪悍善战的气质。

周洁《清代〈方略〉研究——以〈平定金川方略〉为个案》<sup>[34]</sup>将《平定金川方略》与《清高宗实录》中的相关内容进行比较,发现二书对第一次金川之役的记述不一致的地方很多,认为二书的不一致是编纂时代背景和指导思想不一样、方略馆和实录馆运作和管理制度不一样、史官个人因素等原因造成的;将《平定金川方略》与档案材料相比,档案作为第一手资料其史料价值优于《平定金川方略》,但后者叙事脉络清晰,语言表述洗练、扼要,便于阅读和使用。

黄清华《〈御制平定金川勒铭噶喇依之碑〉考

介》<sup>[35]</sup>介绍了该碑所在位置、形制及内容等,并考释碑文中的一些关键词,认为“御制平定金川噶喇依之碑”是清朝乾隆金川之役的形象记录,是一件我国古代战争的重要文献实物遗存,是古人留给金川的一笔宝贵文化遗产,立体地展示了清朝乾隆年间大、小金川的自然风貌和积淀深厚的历史文化,是研究大、小金川历史的珍贵实物。黄清华《〈御制平定金川勒铭勒乌围之碑〉解析》<sup>[36]</sup>主要结合《金川琐记》和《绥靖屯志》等文献来介绍碑的形制和内容,并对碑文进行初步考释,还将碑文与文献相互参证,指出御制平定金川勒铭勒乌围之碑,它不只是记叙了这场战役的详细经过,而且还涉及乾隆帝时期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和牵连到的重要历史人物,为研究大小金川之役、大小金川的历史以及重要历史人物提供了珍贵的实物史料,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 三、结 语

从已经掌握的国内外研究动态来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主要围绕大小金川战争的过程、善后及影响等问题展开论述,还有少数学者开始关注其他相关问题,为我们提供了一定的学术研究基础,但总体上还存在明显的缺陷。这种不足可大致归纳为:一是选题缺乏新意,多半聚焦于对战争的经过、结果及善后措施的一般性描述和粗浅分析,只有极少文章开始注意难以攻克的原因和社会动员与后勤运输这样小切口深挖掘的问题。二是已有研究成果的史料来源多半限于官书,鲜有利用诸如《金川档》《军机处录副奏折》《宫中档乾隆朝奏折》《清宫珍藏海兰察满汉文奏折汇编》等相关档案。这表明,今后我们研究大小金川问题应当在相关档案的运用上狠下功夫,在此基础上不断拓展该题的研究深度和广度,使我们的研究成果更具特点和力度。三是将金川战争简单地归入民族史、边疆史、地方史、战争史的研究范式,很少对其作整体研究。因此,要想在金川战争的相关研究推陈出新,研究者必须在档案史料的利用和研究视角拓展方面下苦功。

### 〔参考文献〕

- [1]程穆衡.金川纪略[M]//张羽新.中国西藏及甘青川滇藏区方志汇编:第43册.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
- [2]王昶.蜀微纪闻[M]//张羽新.中国西藏及甘青川滇藏区方志汇编:第43册.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300-301.
- [3]赵翼.皇朝武功纪盛[M]//佚名.瓠北先生年谱.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
- [4]魏源.乾隆初定金川土司记[M]//圣武记.北京:中华书局,1984.
- [5]庄吉发.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M].台北:台湾故宫博物院,1982.
- [6]曾唯一.乾隆朝平定大小金川的善后事宜[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86(6):68-74.

- [7]李涛.试析大小金川之役及其对嘉绒地区的影响[J].中国藏学,1993(1):124-135.
- [8]雀丹.评乾隆两度平定金川的实质[J].西藏研究,1989(2):129-141.
- [9]戴逸,华立.一场得不偿失的战争[J].历史研究,1993(3):30-41.
- [10]曹启富.略论乾隆年间大小金川之役[J].四川大学学报,1999(6):39-44.
- [11]李鸿彬,白杰.评乾隆朝金川之役[J].清史研究,1998(2):66-76.
- [12]张婷.试析第一次金川战争爆发的直接原因[J].四川大学学报,2004(增刊):84-95.
- [13]彭陟焱.乾隆初定金川战争钩沉[J].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3(4):13-19.
- [14]彭陟焱.试论乾隆平定金川之影响[J].西藏研究,2003(1):22-29.
- [15]彭陟焱.乾隆朝大小金川之役研究[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04.
- [16]齐德舜.清乾隆年间攻打川西北大小金川战役研究[D].兰州:兰州大学,2006.
- [17]王戎笙.清代全史:第四卷[M].北京:方志出版社,2007.
- [18]李家瑞.川西北嘉绒藏族的土屯制度[J].思想战线,1983(5):31-38.
- [19]曾唯一.乾隆平定金川后的善后事宜[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86(6):68-74.
- [20]潘洪钢.乾隆朝两金川改土归屯之兴起[J].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5):35-41.
- [21]潘洪钢.清代乾隆朝两金川改土归屯考[J].民族研究,1988(6):62-71.
- [22]徐怀宝.清代金川改土为屯[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5(5):56-63.
- [23]蔡仁政.金川嘉绒藏族的土屯制[M]//四川藏学研究:第4辑.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7.
- [24]石硕.试论清代乾隆年间藏族地区改土为屯政策[D].成都:四川大学,2006.
- [25]王惠敏.清军难以攻克大小金川之原因探析[D].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2011.
- [26]DAI Y C. The Qing state, Merchants, and the military labor force in the JinChuan campaigns, late imperial China[M]. Baltimore, Marylan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1.
- [27]赖福顺.乾隆朝重要战争之军需研究[M].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1984.
- [28]彭陟焱.乾隆朝大小金川之役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0.
- [29]杨嘉铭.四川甘孜阿坝地区的“高碉”文化[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8(3):25-31.
- [30]陈庆英.北京香山藏族人的传闻及史籍记载[J].中国藏学,1990(4):104-115.
- [31]陈力.“金川纪略”及其相关问题[J].四川大学学报,1992(3):90-94.
- [32]刘源.从清代档案看清政府对金川土司政策[J].中国藏学,1993(4):123-128.
- [33]聂崇正.清平定两金川功臣像钩沉[J].收藏家,1995(4):48-50.
- [34]周洁.清代“方略”研究:以“平定金川方略”为个案[D].武汉:武汉大学,2004.
- [35]黄清华.“御制平定金川勒铭噶喇依之碑”考介[J].四川文物,2007(3):74-76.
- [36]黄清华.“御制平定金川勒铭勒乌围之碑”解析[J].四川文物,2009(2):79-83.

(上接第65页)

口仍存在相当劣势,尤其在中等科技含量以及高科技含量制成品的出口方面,相当种类的商品存在显性比较劣势以及竞争劣势。

研究认为,我国贸易商品出口结构优化与转型的路径应基于现有的禀赋资源条件下,继续鼓励和促进具有传统贸易比较优势的出口外向型产业的发展,推动其实现高级化和动态比较优势;其关键在于劳动密集型产业领域从加工贸易向服务贸易的转变;应强调非完全竞争条件下企业的自主经营与自主创新地位,培育和催生生产要素的高级化,通过优化我国出口主导产业的技术结构、需求结构和品牌结构,培育我国出口商品的竞争力,实现其从传统静态比较优势向高级化动态比较优势的转变,进而实现以贸易竞争优势为主体的出口商品结构转型。

#### [参考文献]

- [1]江小涓.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的决定因素和变化趋势[J].经济研究,2007(5):4-16.
- [2]曾伟,雷新华.云南对东盟出口比较优势研究[J].学术探索,2014(1):2-5.
- [3]魏浩,毛日昇,张二震.中国工业制成品贸易竞争力及结构转型分析[J].世界经济,2005(2):12-13.
- [4]曾伟,徐慧.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的理论蕴意及其在我国的运用[J].商业时代,2010(18):1-2.
- [5]张群,张曙霄.基于产品技术含量分类的中德出口商品结构比较[J].商业研究,2014(8):5-6.
- [6]毛日昇.中国制造业贸易竞争力及其决定因素分析[J].管理世界,2006(8):1-10.
- [7]肖利秋.我国出口商品结构优化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广东社会科学,2013(1):8-9.